

Observer 美国正在酝酿的以新能源为主导的跨产业技术革命,有可能使美国再次领导世界产业变革潮流,在全球范围内重绘产业地图,进而确立新的竞争优势。面对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产业可能的大洗牌,中国绝不应局限于使经济走出目前困难的策略性选择,必须以前瞻性的技术投入把握金融危机后的世界产业走向,决策层亟须尽快拿出实质性措施。

中国不可缺席金融危机后的产业革命

每一次大规模经济危机都会带来产业的大调整和全球分工格局的深刻变化。

70余年前的那场大萧条尽管使美国经济倒退30年,但依靠汽车、石化、通讯等领域的技术创新,美国经济仅用了8年的时间即得到恢复,进入重工业化时代,一跃成为世界首席经济强国;30余年前的两次石油危机期间,以钢铁、汽车、化工等为代表的重工业遭受严重打击,但已有丰富应对危机经验的美国大力发展计算机、航天航空、生物工程等一批高附加值、低能耗的新兴产业,美国顺势完成了经济结构的转型;差不多与此同时,欧洲在计算机、机器人、通信网、生物技术、新材料等领域先后取得了一大批超前技术成果,为产业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

本次危机大概也不会例外。目前,全球产业经过本次经济与金融危机的冲击,正处于调整与恢复时期,但是产业调整与发展步伐却不会因为金融危机而

而止步。美欧和日本等国政府及其处于顶层的一些企业正在酝酿一场产业革命,力图造就一个能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新引擎的超级产业。

根据奥巴马新政的改革逻辑,美国在对金融止血并稳定了汽车、房地产等行业之后,必须找到一个能够形成较强产业并能提供巨大就业空间的超级产业,作为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在历史上,汽车和信息技术曾经扮演过这样的角色,现在,美国准备让新能源产业登场了。因为新能源战略符合产业革命所需具备的三个特征,特别是其对于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可能带来的巨大变化以及对汽车和建筑等传统产业链的渗透和延伸,将有可能形成一个能够支撑美国下一个经济繁荣周期的产业群。

这是奥巴马上任伊始,即在新一轮财政支出中划出400多亿美元用于新能源的开发,以期获得新能源技术研究的重大突破。一旦该技术成熟,美国将结合其依然强大的金融服务优势以及丰富的新技术产业化经验,在全球范围内掀起自

新经济革命之后的又一次产业革命,重新切割全球产业版图,在将美国从目前的经济与环境困局中解脱出来的同时,再次占据世界经济的制高点。

不仅如此,美国政府和企业还瞄准可能在左右世界经济未来发展的一些潜在战略产业抓紧技术投入,例如,奥巴马政府仅对生物医学领域的基础性投入就超过了100亿美元。另一方面,以微软、英特尔为代表的美国顶尖企业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普遍增加研发投入,微软去年第四季度研发投入增长了21%;英特尔去年第四季度净利润尽管下滑了90%,但今年其研发预算高达54亿美元;无疑,他们是在为未来的成功

“播下种子”。面对美国正在掀起这场以新能源为主导的跨产业技术革命,中国必须从关于国家产业安全和争取积极主导未来国际分工的高度,来审视中国目前应对危机的策略和产业发展战略。

应当说,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注意到了这样的问题,中央强调通过扩大内需保增长的同时,把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努力在危机过后形成以科技进步和创新为基础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竞争优势。但从已实施的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来看,决策层面对经济可能持续下行的风险,短期来看重

还是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的拉抬作用。尤其各地方政府和企业更是把绝大部分注意力放在如何走出目前困难局面的策略性选择上。这不能不让人担心。笔者非常明白,经济每下滑一个百分点对就业以及社会稳定意味着什么,但在全球产业可能面临洗牌之际,国家正在借此机会重塑经济竞争优势的紧要关头,如果我们仅仅着眼于如何使经济走出低谷的策略性选择,而忽视了

了对可能影响中国未来国际分工地位的战略产业的投入,即便中国在大规模经济衰退浪潮中第一个上岸,又有多少战略价值呢?当然,笔者注意到,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等相关官员曾呼吁,中国不能因为当前金融危机导致能源供需矛盾缓和,而忽视新能源产业发展,而有关应汲取过去一些产业发展的沉痛教训,密切跟踪世界新一轮新能源发展方向,加强新能源技术研发,加大对新能源产业发展投资,真正把新能源发展放在一个重要战略位置的讨论也不曾中断。而且从宏观层面来看,中国在这方面也有一定技术基础的,例如科技部已在相关科技计划中对节能和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核能、清洁汽车等具有战略意义的低碳前沿技术已经有了部署并加大了投入力度。中国在新能源汽车、太阳能、风能等领域的研究,有些在国际上也是居于领先地位,但从促进经济战略转型的高度来看,国家对以新能源为主导的跨产业技术投入显然不够。笔者呼吁,决策层在保增长、促发展的同时,亟须高度重视这类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尽快拿出实质性的措施。

中国切不可缺席这场可能改写世界经济版图的产业革命。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

本报联手央视经济频道 共同关注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

各界对物流认识还不很到位

从统计数据来看,去年我国物流业的增加值在整个服务业增加值中,占了16.5%,占了GDP的6.6%。物流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一个非常重要的服务业。物流业涉及领域广、吸纳就业人数多,对促进生产、拉动消费的作用大。

但是现在社会上对物流的认识还不很到位。物流的概念是什么?是指物品从供应地到接收地,实体流动的一个过程,是对运输、仓储、包装、装卸、加工、配送、信息等环节进行有整合的一个过程。我想用一个大家很熟悉的产业来做比较,这就是旅游业。物流离不开运输,就像旅游离不开运输一样,但运输和物流,就像旅游和物流,有很严格的区别。物流就是物流,运输就是运输,物流肯定要去整合运输。

规划定了一个近期的目标和近期的目标,近期目标是要解决金融危机对这个行业所带来的一些问题,实现物流业的平稳发展,稍微长一点的目标,是到2011年建立起完善的物流服务体系,使我国物流业的增加值每年能够超过10%。

规划鼓励制造企业尽可能采取先进的物流管理的理念,对物流企业物流的流程进行重组、整合、分离和外包,把大量的物流需求释放出来,提供市场。这样,物流企业就能有更多拓展业务的空

据我们调查,现在国内的物流业务平均下降20%到30%,有的业务甚至下降60%。为应对金融危机,物流业的调整和振兴规划的几个部分都涉及鼓励制造企业外包自己的物流业务。规划的重点任务,第一条是培育物流的服务业市场,第二条就是鼓励物流的社会化和专业化。

制造业物流外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市场要有充分竞争,我觉得现在的金融危机为制造业物流外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时机。需求不足,业务不足,就会逼着企业去压缩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小天鹅老总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他说,家电行业的利润在15%-17%的时候,企业不可能把物流去外包,他根本还顾及不到这一块,当市场充分竞争后,家电行业利润非常薄了,比如说只有1%,各个环节稍微不注意,企业就面临亏损,这时家电企业才会考虑把它的物流业务整合外包,小天鹅采取这种模式以后,成本就下降了超过30%,对市场反应的能力提高了,市场竞争力也提高了。

现在物流企业的营业税有重复纳税的现象。比如一家制造企业有项业务给我10万元,可能其中有8万元外包给运输,还有一万元包给仓储公司,自己所得可能就是1万元,可按现在在的营业税的征收管理办法,交一次就要上一次营业税。开出10万元发票给客户了,就得按10万元上缴营业税。

其实,税收上有一些政策是已经想出来了,但目前还没有惠及到所有从事物流的企业,原因在什么是物流企业很难界定。国家税务机关觉得,最好操作的办法是实行目录管理,目前一直采取试点的目录管理的办法,我们做了四批目录,近400家企业享受这项政策。当然,许多地方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这次规划谈到的另一项重大任务,就是加速物流企业兼并重组,做强、做大物流企业,提高它的抗风险能力。如果我们物流业整个物流费用占整个GDP的比率达到了像现在在,日本等国的水平,能占到9%或者10%,那么我国物流业的竞争力就非常强了。(作者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根据节目整理,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将在今晚18:05播出)



意去年伪造商品的销售总额达71亿欧元,令普拉达(Prada)和古琦(Gucci)等高端奢侈品牌以及奶酪、葡萄酒的高品质品牌大受冲击,税收损失53亿欧元。就连牙膏和清洁剂这样的日用品也有假冒,政府倍受困扰。

更为确定的物价稳定信号尚未出现

陈波迪

依据央行的最新数据,企业商品价格已连续5个月同比负增长,但是3月出现了自去年8月以来的首次环比上升。而此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首季CPI及PPI均同比大幅反弹。

在此背景下,有关通胀预期与通缩压力的争论又热闹起来。支持通胀的观点认为,即便是在去库存化的过程中,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也会导致过多的货币追逐待消化的库存商品,甚至引发特定预期下的再库存化。央行数据显示,一季度人民币贷款新增458万亿元,即便是剔除短期票据融资1.48万亿元,对实体经济支撑较大的信贷投放也超过了3万亿元。此外,美联储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导致美元急速贬值,受此影响,投机资金趁机推高了大宗商品价格,初级产品价格由此回升,并加剧了市场对于通胀的担忧,全球经济陷入滞胀的可能性加大。

而担忧通缩的观点则认为,全球性金融危机的阴云并未散去,经济触底的曙光仍未显现。今年前3个月,全

国国有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43257.1亿元,同比下降7.6%,表明市场需求并未显著回暖。同期国有企业存货同比增长14.1%,一季度末比去年底增长2.4%,也表明去库存化之路尚在征途上。货币层面的宽松也并未转化为实体经济的坚实需求,通缩压力进一步加剧。

但单一季度数据,很难判断物价是否已回暖。首先,物价走势存在短期不确定性,难以在较短时间内形成趋势。比如,去年春节期间的冰雪灾害天气,直接导致了一季度粮食、蔬菜等食品价格上涨,推高了CPI的基数。在翘尾效应的作用下,即便是真实物价保持去年的水平,一季度CPI也会同比出现较大回落。由此,前期美元贬值导致的有色金属价格反弹,极有可能是下游需求疲软的回路。

其次,物价指数具有传递性,难以从单个指标的反弹确认物价水平的整体回暖。一般情况下,企业商品价格指数(CGPI)领先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约6个月,而PPI又领先消费者价格指数(CPI)3至6个月。即便是3月企

业商品价格环比增长,但CGPI再次降至93.4,为央行自1999年公布该项数据以来为新低。从传导周期来看,企业商品价格企稳后,也至少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方能确认物价水平的整体回暖。

最后,终端需求并未确定性回升,物价回暖缺乏交易基础。虽然市场普遍认为,一季度6.1%的GDP同比增速,为年内低点,二、三季度GDP增速会显著提高。但外国市场需求持续萎靡,内需继续改善的空间难以有较大突破,终端需求并未一定随经济回暖而同步回升。不过值得欣慰的是,进出口数据的同比降幅已大为收窄,居民消费品零售总额仍保持了平稳的增长。如果上述势头能持续下去,供需平衡将成为物价稳定的坚实基础。

笔者认为,目前的数据尚不足以判断物价回暖,但物价再次大幅下跌的可能性已不大。或许在企业商品价格指数触底反弹之后,我们有望在翘尾效应的逐渐淡出时,发现更为确定的物价稳定信号。(作者系中国银行私人银行(深圳)投资顾问)

■外论一瞥

《经济学者》4月23日文章 世界经济露出“希望曙光”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上周末在华盛顿举行会议,多国财政部长和银行家都将与会,但此前却弥漫着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认为世界经济的曙光已经显现。然而,这并不是事实。

乐观主义者存在着两个“误区”。一方面,他们将信心放在了错误的地方——曲解了利率下降缓慢这一现象,这并不是经济即将复苏的征候;另一方面,特别是政治家们对“好消息”特别容易产生骄傲自满情绪——从而拒绝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而致使经济跌到更深的谷底。

不过,在事实面前,“盲目乐观”将消失得很快。实际上,在各国政府大规模救市之后,经济恢复的效果却并不明显。虽然,也有一些增长,但却并不能降低失业率。人们担心,也许要不了多久,大部分的世界经济就只有依靠政府这一条路了。想想那到底意味着什么吧?

大部分富裕国家的人们眼睁睁看着失业率攀上两位数而毫无办法,而危机的另一种可怕疾病——通货膨胀也将长期存在。这样,政府的债务必将屡创新高,从而拖累经济复苏。据统计,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债务年内将达到GDP的75%,到2010年则将达到100%,2014年则高达140%。这样,持续的失业、多年的投资疲缓和债务负担,反过来将极大地拖垮世界经济。

其实,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就是认为最坏的局面已结束。事实上,世界经济形势现在依然非常严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可以说,更黑暗的日子还在前头。

(张金翠 编译)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4月23日专栏文章 碳关税并不公平

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最近想出一个“好主意”——对来自别国的商品征收“碳关税”,因为为了减低温室气体的排放美国决定采用一些“低碳”技术,但那些没有采取“低碳”技术国家的商品相比较,有人担心会降低美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产生国际间的“不公平”贸易。

虽然环保科学家们说,地球能承受的温室气体总量有限,但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些温室气体的具体排放“配额”在国家间是如何分配的。因此,现在的关键是,各国必须为此展开多边对话以确保公平贸易——否则“碳关税”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

第一,此举并不能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事实上,每个国家都会挑选对自己有利的规则,而决不会认同“美国的规矩”,这样在气候控制问题上还是各行其是。

第二,“碳关税”对全球经济发展有害的政策,一方面增加了关税壁垒,另一方面又搞乱了全球商业秩序。

第三,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各国很容易把“碳关税”视作贸易保护主义的旗号。

情况如此不让人乐观,然而更糟糕的是——从目前来看,WTO对于各国围绕温室气体排放的争论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因此,对于国际间达成协议,我们还需要等待许多年。但有一点却是明确的,“碳关税”不但不会让我们达成协议,相反还会成为障碍。

(作者:哈佛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拉塞尔·布雷斯特 张金翠 编译)

《卫报》4月24日专栏文章 欧洲更多融合并不能解救世界经济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尔利希·贝克教授4月13日说,经济危机呼吁一个欧洲的建立,然而,在欧洲内部打通边界,不是他所提出的全球问题(恢复增长、保障经济安全)的解决方案。现在主要面临的挑战是重新构建全球化经济中的市场概念。

贝克引用丘吉尔的话,说如果欧洲能联合,“4亿人民将享受到没有限制的幸福”,但那是1946年的情形。现在是在因多谎言以自由市场的名义出现,市场交易信用崩溃。

贝克说,“二十年前,柏林墙意外地随苏联解体倒塌了,现在资本主义模式正在面临倒塌的威胁,并拖拽欧洲一起陷落。”然而,这不仅仅是欧盟,而是整个金融融合的欧洲经济。中期的挑战是设计、执行金融资本全球运动的规则,这将减缓一国的金融错误跨越地理边界的扩散速度。所以,在搞清追踪传染扩散的措施之前,打破边界不是这一特别问题的解决办法。

贝克质问“谁,如果不是欧盟,有必需的经验来祈求保佑超国家的社会公益?”抵抗保护主义、追求社会公益要求超越国家范围的福利。就此而论,一个更加融合的欧洲是符合愿望的,但这仅是当它也少点保护主义的时候。贝克有关在自由市场的圣坛前不适当地卑躬屈膝已带给我们很多危害,而这一圣坛正是被并不理解市场有效性或市场失败的政客吹捧起来的意见是正确的,但他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并未击中要害。丘吉尔1946年对欧洲融合的热情并不适用于我们现在面临的全球问题。

(作者:香提·卡拉瓦提(英国班戈大学班戈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贺艳燕 编译)

《金融时报》4月23日文章 印度“黑钱”的诅咒

印度反对党领导人阿德瓦尼(L.K. Advani)通过发布前选举宣言点燃了这场政治斗争,他说印度每年通过非法金融外流或黑钱(black money)正在丢失数百亿美元。他声称如果被迫选为执政力量,将奋力追回这些丢失的资产。

在关于印度黑钱问题的讨论中,阿德瓦尼引用了GFI(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对资本外流的评估:每年来自发展中国家世界的非法资金外流总量达1万亿美元,印度以每年220亿至270亿美元的资本外流在其中排名第五。

作为一种最受公众欢迎的避税方式,贸易溢价是隐藏在发展中国家非法资本外流背后的动力。贸易溢价是通过多国合作操纵商业盈余来最小化税收责任的惯例。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因其石油出口国的地位而较少受贸易溢价伤害,因为石油很难被错误估价。犯罪活动、腐败和公司逃税的资金流动很自然成为偷税漏税的,通常这些资金最终会进入以低管制和高机密为特征的金融中心,这使得搞清非法资金流变得很难。

到目前为止仍然缺失的,拆除这一阴暗网络和加强全球金融体系更大透明性和责任感所需的具体改革方案。经合组织提出的税收信息交换标准虽然愿意良好但仍不足以解决这一问题。

印度黑钱问题已在选民中产生了共鸣,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家们也引以为戒。(作者:GFI主管雷蒙·贝克 贺艳燕 编译)

Column 专栏 随着技术进步带来金融深化的加速,牙买加体系下的货币乱局将长期困扰人类社会。但是通过政府间制度安排等非市场途径来弱化美元地位,是不现实的,因为这涉及美国是否愿意慷慨退出,以及退出成本怎么分担的问题。短期来看,发展中国家只有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掌握更多话语权,才能在遏制美国金融功利主义行为方面有所作为。

国际货币体系将持续“亚健康”

说起来,要求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在30多年前就有了,但从从来没有今天这样得到国际关注。这段日子以来,相关问题在民间引起激烈讨论,直接原因是一向低调的中国政府公开强调,通过发展“超主权货币”来解决现有货币体系的弊端,并且得到国外众多美元受害者的呼应。当然,就深层原因来看,这种现象背后,既是由于国人的金融意识开始迅速强化,也是因为经济金融全球化时代,愈来愈多的普通人开始直接或间接感受到国际货币体系动荡对自身的影响。

上世纪20到30年代,应该说就是现代国际货币体系的一次“战国时代”,直接导致了曾经固若金汤的金本位制度的消亡。各路货币“金融厮杀”经浮沉后,美元借助美国蓬勃增长的经济活力支撑,逐渐占据了世界货币的

“桂冠”。

1944年,当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确立其霸主地位时,美元如同在欧洲大陆的美国大兵一样代表着实力与希望。应该承认,当时美国人的富足与责任心,使美元维持了数年的稳定,引领混乱的国际货币体系走向正轨。但1950年之后,在战争等因素的作用下,美国频繁发生各类危机,焦头烂额的白宫终于放弃了货币荣誉感,开始滥发美元来试图渡过危机。这种“饮鸩止渴”,以邻为壑的行为,终于在70年代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当尼克松政府的财长康纳利在争辩中说出“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麻烦”时,便意味着美元彻底放弃了“货币责任”,全球再次陷入货币乱局。

1976年牙买加体系所确定的浮动汇率制度,从根本上看,只是一种过渡性选择,这一体系延续到今天,国际金融危机成为家常便饭,其恶劣影响

也令人瞠目。从表面上看,由布雷顿森林体系演变到牙买加体系,美元地位明显削弱了,但是与此同时,由于放弃了责任的束缚,美国的美元利益达到新高,美国利用货币霸主地位向全球征收“铸币税”的行为愈演愈烈,逐渐令美国的“富朋友”和“穷兄弟”都无话可说,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一次“春秋”时代。

如今,美国的“基本面”实在已经不足以支撑美元的地位。2000年,美国GDP占世界经济比重达到30.6%,2007年降至25.4%,在全球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也从2000年的12.3%降至2007年的8.4%,进口额比重从19.2%降至14.3%。美国经济在下降,在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后,以汽车为代表的制造业竞争力也不复存在。美元汇率波动剧烈,早已失去了“大哥风范”,也不符合对世界货币的稳定性要求。然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以美元

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病入膏肓”,却还远未陷入“墙倒众人推”的境地。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在全球的比重事实上在20%到30%之间波动,而每次经济危机爆发时,反而其比重有所上升。研究表明,该比例在1980年至1985年之间由23.6%上升到32.7%,从1991年至1993年由24.9%上升到26.8%,从1995年至2001年由24.9%上升到31.9%。而三次全球危机分别发生在1980年至1982年,1990年至1992年,2000年至2002年。由此来看,在现有体制下,源于美国的危机总是能够被顺利转嫁出去,这就形成了个怪圈:当危机发生时,美元人人喊打,而当危机过后准备“真打”时,支撑其地位

可以预见,随着技术进步带来金融深化的加速,牙买加体系下的货币乱局将长期困扰人类社会。在此情况下,必须有一种信用货币充当“庄家”角色,从而避免全球货币体系最终崩盘。现在看来,也唯有欧元对美元有一定的替代性,但也受到欧元区主权国家的利益冲突限制,日元在结算和价

值贮藏方面也先天不足,人民币则只是“初生牛犊”。因此,美元主导体制对于我们只能是一种无奈的次优选择。

现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多基于政治目的,而对于企业、金融机构和个人来说,在各国经济都因重重时,仍然是“鞋子里面拔将军”,还是相对偏好持有美元。同时,通过政府间制度安排等非市场途径来弱化美元地位,也是不现实的,因为这涉及美国是否愿意慷慨退出,以及退出成本怎么分担的问题。当然,且美元垮台的受害者不仅美国,东亚等净储蓄国也将首当其冲。

如此说来,除非国际势力格局发生剧变,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这种“亚健康状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难以改变。当然,这也不意味着其他国家束手无策。世人美元主导体系不满的核心原因,是美国人做得太过分。短期来看,发展中国家只有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掌握更多话语权,才能在遏制美国金融功利主义行为方面有所作为。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